



尼加拉瓜桑定政權當前的困窘



劉天均

一、前言

尼加拉瓜在左傾的桑定政權統治下，目前正面臨著一系列的棘手問題，諸如經濟問題、內政問題、安全問題、政教衝突問題、意識形態的取向問題、對外關係及外交路線問題……等，可謂問題重重，難關處處。形成上述各問題的因素與條件固然相當曲折而複雜，但究其主因，則多與蘇慕薩世家的獨裁統治、美國長期的中美洲政策，以及桑定政權近年的左傾而急進之政經路線有關。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統治尼國長達四十餘年（一九三四—一九七九）之久的蘇慕薩家族政權，在桑定游擊隊的「最後攻勢」下，終於崩潰了。而蘇氏家族政權所賴以存活的支柱——美國，因此也就不得不暫時收拾其長期宰制尼國的雄心，而從其「後院」的一角退却下來^①。然而這兩股相互結托和相互提携的力量，從未完全放棄其東山再起與捲土重來的打算。殘餘的蘇慕薩

註① 美國在尼加拉瓜具有長期的政經利益，遠自一八五〇年代之初，為維護其「門羅主義」及推行其「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政策，便實際地干預尼國的政經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事件，便是威廉·華克(William Walker)這位「國際遊俠」竟於一八五五年六月率兵征服獨立之尼國，並於次年七月被「選」為尼國總統，支配尼國政局幾達三個年頭，直至一八五七年四月始被逐出局。嗣後，美國會時斷時續地武裝干涉尼國的內政，在老羅斯福及塔夫特(Taft)的「銀彈外交」及威爾遜的「使命外交」政策下，美國海軍陸戰隊會長期駐留尼國二十年之久。其後便透過蘇慕薩父子的世襲政權，達到間接支配尼加拉瓜及中美洲政局的目標。請參John A. Booth,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pp. 16-20, 27-50; Frederico Gil, *Latin American-United States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p. 64; Thomas G. Paterson et a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New York: D. C. Heath, 1977), pp. 121-150.

勢力^②，正企圖借助於美國之支援，向桑定政權發動反撲；而美國也正在利用前者作為其馬前卒，藉暴力方式與經濟封鎖的手段，去弄垮這個搖搖欲墜的左傾政權，以除其肘腋之患。

二、困難重重的經濟問題

桑定聯合陣線 (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FSLN)^③ 政權承繼蘇慕薩的統治權之後，不僅承受了一個被蘇氏家族及其同夥所搜刮一空的「國庫」，而且還須替前屆政府償還十六億美元的外債^④。再加上一個久經戰亂所蹂躪的經濟環境，桑定政權須面對的經濟困窘便益加嚴重了。

桑定政權建立後，曾宣佈了三項基本國策：(一)在政治及社會制度方面採取多元主義；(二)在對外關係方面履行不結盟政策；(三)在經濟方面實行私有及國有制並存的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在所謂「混合經濟」制度下，桑定政權便開始推行其所謂新的經濟重建政策：土地改革與部份企業國有化。

(一)土地改革：尼加拉瓜既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新建的桑定政權立即將蘇慕薩及其僚屬所擁有的全部莊園（約佔全國全部農田百分之四十）收歸國有，改為國營農場或建為農業合作社。一九八一年又實施第二次土地改革，將原屬地主而未復耕的田地以及可供農牧業開發之土地，再行征收與放領。目前已有四四、一一〇個農戶參加了農業合作社，共組織了三千多個合作單位，擁有一、三五五、三八六「滿薩那」(Manzana)^⑤土地；另有一、五五五、四〇〇「滿薩那」土地屬國營農場，共由六萬

註② 蘇慕薩 (Anastasio Somoza Debayle) 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失位而亡命海外，爾後在一九八〇年九月為巴拉圭及阿根廷之左傾急進分子刺殺於阿松森。而蘇氏所遺留之「國家防衛軍」(自一九七九年之兩千人擴充至當前的八千人左右)，現正在宏都拉斯接受美軍之支援與訓練，並沿尼國北部邊區從事游擊活動。是當前反抗桑定政權的三股反對力量 (Contras) 之一。

註③ 「桑定聯合陣線」係以桑定諾 (Augusto César Sandino) 農民民族抗美英雄 (1927-1933) 之命名名之。桑定諾當年的革命目標頗為單純，即為貧困的農民請命，為尼加拉瓜的民族爭取自由——反對美國的干涉主義。而「桑定聯合陣線」則由方賽加 (Carlos Fonseca Amador) 創建於一九六一年。方某原是一個共產黨 (Partido Socialista Nicaragüense-PSN) 黨員，脫黨後即倡組該陣線，主張以暴力方式奪取政權。一九七五年左右，該組織力量頗為有限，僅有百餘裝備甚差的兵員。嗣後該陣線在蘇慕薩「國家防衛軍」(Guardia Nacional) 的圍剿下，分為三股，個自為戰，直至一九七九年五月始在海外組織一個聯合的「國家指導委員會」(Joint National Directorate-DN)，作為該陣線之統一指揮中心，也是當前尼國最高的權力機關。

註④ 在蘇慕薩所遺留下來十六億外債中，除自西班牙和以色列所借之五千萬進入蘇家私囊者外，桑定政權承認一律償還，惟礙於財政拮据，故一再請延。

註⑤ 「滿薩那」為中美洲各國所通用之土地面積單位，一個「滿薩那」等於一·七英畝 (Acre)。

多農工經營之^⑥；此外，尚有中小型自耕農同時並存。在土地制度方面，係採取國有、公有及私有並存制。

在農業政策方面，由政府統一規劃生產，採取貼補方式，鼓勵增產，所以，農業生產力居全國第一。一九八一年即恢復了戰前的生產水平，而蔗糖的產量竟超過一九七九年前之產量。唯因政府缺乏資金，無法兼顧中小自耕農之利益，而使彼等成爲「混合經濟制度」下之犧牲者，同時也形成尼國農業生產力最爲薄弱、生產意願較低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面，由於桑定政權在對外關係上採取激烈的反美態度，迫使美國於一九八二年將其「標準水果公司」(Standard Fruit Company) 撤出尼國，致使政府每週失去四十萬美元的外匯收入^⑦。而且該年五月份的水災，使農產生產遭受極爲嚴重的損害(蔗糖及棉花等共損失一億八千多萬美元)，並使數項農業發展計劃遭到擱置或後延。

(二)在大型企業改革方面：全國銀行、保險、礦業、林漁業及水電公用事業等一律改爲國營，其他輕工業如水泥、紡織、製烟、煉油、食品加工業等則採取公私合營或公私並存制。大致言之，目前企業國有化已達四〇%，其餘六〇%的工商企業仍保存在私人企業家的手中——七五%爲製造業、三〇%爲建築業、一般服務業爲四五%上下。現有各行之國營企業約在一千五百家左右。

由於國有化政策的實施，農業方面在一九八〇至八一年曾出現增產的趨勢，尤其在咖啡及蔗糖兩項經濟作物上，較一九七九年增產七·八%，惟棉花產量則逐年下降。至於工業發展，則與農業的情況完全相反。國有化政策的推行，爲工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阻力。其主要原因在於：私有資本家對現行的經濟政策存有疑懼之心，不僅投資意願低落，而且藉機使大批資金外流；不僅資金外流，管理人才及技術人才也多趁機出國；其次便是尼國局勢不穩及美國對桑定政權所形成的軍事壓力，迫使外資採取觀望不前的態度，以及難以自世界金融機構(尤其是美國所控制的金融機構，如世界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取得經援。所以，一九八二年以前，全國之工業生產力僅達一九七九年之六〇%^⑧。

桑定政權面臨著如上之工業困境，只有在國有化政策上採取退却措施，一面與代表私有企業界的「私人企業最高理事會」(Consejo Superior de la Empresa Privada—COSEP) 以及「尼加拉瓜發展研究所」(Instituto Nicaragüense de Desarrollo—INDE) 等機構達成妥協條件，保證保護私人企業之合法財產、合理利潤及正常經營方式等^⑨；另一方面則與彼等簽訂

註⑥ Daniel Ortega Saavedra on FSLN Achievements, FBIS (Latin America), 18 July, 1984, p. P-9.

註⑦ The Europa Year Book 1983, pp. 1108-1109.

註⑧ Ibid.

註⑨ John A. Booth, *op. cit.*, p. 192.

生產合同 (Convenios de Producción)，同意以讓價、限量的方式，折換政府的信貸及換取統一進口的原料，期能鼓勵私人投資、提高生產力和增加產量。然而這種鼓勵政策與讓步措施，並不足以改變「唯利是圖」之資本家疑慮心態以及彼等之「囤積居奇」的「好貨」心理，致使政府與私人企業界時生齟齬，間有衝突^⑩。

進一步言之，尼國當前的經濟情形，可謂每下愈況。其成因一則固與桑定政權所採取之政經政策有關，另則與美國的對尼態度頗為攸關。美國的雷根政府極欲透過間接或直接的武力方式（詳後）及經濟破壞等雙重手段，去弄垮這個在對外關係上傾向蘇、古的桑定政權——「第二古巴」。例如今年春季的水雷之戰與尼宏邊界的「反抗軍」侵襲（尼哥邊境之游擊活動與北聖約翰鎮 (San Juan del Norte) 之佔領則另當別論），均旨在造成上述之雙重效果——軍事壓力與經濟破壞。同時，尼國為肆應此一情勢，決定自去年秋起實行征兵制及將全國總預算的四分之一用於國防支出，從而使本已相當拮据的財政無法用於公共投資，甚至維持基本的收支平衡已成問題。而大量的勞力投入國防，更直接間接地影響其農業的生產。因此，自一九八三年以來，尼國的外貿赤字連年高達一億美元，失業率為二四%（官方公佈為一五%，失業人口與征兵人數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函數關係，因有別的因素介入其中，如年齡、性別……等），物價上揚四〇%（以一九八二年為一〇〇，官方稱增為二四%），而國內生產毛額 (G.D.P.) 則下降一%。尼國當前的經濟困窘情況，可由此推知。此外，為應付經濟困窘所實施的配給制度以及因此所引發的不滿情緒和黑市交易等，更為尼國社會增加了許多不安不穩的因素，自不待言^⑪。

三、欲治彌紛的政治問題

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這句諺語，適足以說明當前的尼國政情。鑒於政治層面所涉及之點、線、面較為深廣，而其所牽涉的問題也遠較經濟複雜，故此擬僅就其影響尼國當前政局較深，以及可能決定桑定政權今後政治命運之犖犖大者，如桑定集團的內鬨、尼國內部的黨派傾軋、今年十一月四日實施大選等問題，作為抽樣性的陳述對象，藉以說明桑定政權在短短的五年（一九七九—一九八四年）過程中，所已遭遇及正在面臨的各項政治困境。

註⑩ 例如一九八〇年秋的「國會」(Consejo de Estado 這是一個由愛國陣線、政黨、公民團體、工會、各同業公會及商會等代表所組成之過渡性審議及諮詢機構——「準臨時國會」)之爭，以及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十三企業撤資阻礙國家經濟發展」而遭沒收案等，請參「The Junta Decrees an Emergency», *Newsweek* (International ed.), Sept. 21, 1981, p. 67.

註⑪ 關於尼國當前的黑市交易情形以及因推行配給制度所引發的不滿情緒，請參 Edward Cody, "Enterprising Free Marketeers Defy Sandinista Vision of Supply, Demand" *The Washington Post*, 4 July, 1984.

(一) 桑定陣線及其政權的內部傾軋：桑定陣線及其支配下的「國家重建執政團」(Governing Junta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在組織形式與職能運作方面，是名符其實的「混合體」。這個「陣線」是由當年反蘇慕薩的九個游擊隊首領所領導，其政治背景、目標與取向均不一致，雖然他們曾在一九七九年勉強通過一項「二十點鬭爭計劃」、十七點「政治綱領」^⑭以及上述之三項基本國策等。該「陣線」設一「國家指導委員會」，其組織成員均自稱是馬克斯主義者，但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同時也拒絕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分子，而堅稱是「桑定主義者」或「桑定諾的信徒」(Sandinistas)，以別於共產黨徒。彼等在對外的形象上及對外發表意見時，均能給人以團結一致的印象。而實際上，他們的內部既存在著權力與路線的鬭爭，又有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雖然他們均屬左傾分子。在這個領導集團中，大致可以分為極左、左、中間偏左等三類分子。第一類分子主張對內對外實行徹頭徹尾的馬列主義，走卡斯基的「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步古巴的「蘇維埃化」的後塵，使尼加拉瓜成為「第二古巴」。唯該派勢孤而力單，只有一個阿瑟(Bayardo Arce Castaño)，是現任的「國家咨政委員會」(Consejo de Estado)^⑮主席，只擁有對政策的審議之權，而不具任何實權。領導集團中最具實力者為中間偏左派，該派以尼國強人奧蒂加(Daniel Ortega Savedra)兄弟二人(其弟為 Humberto Ortega 係國防部長)以及擔任農業部長和兼掌土地改革事務的惠勞克(Jaime Wheelock Román)等為中堅，主張採取溫和的社會主義路線及履行不結盟的對外政策，甚至堅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但不放棄其所謂「反對干涉主義——指反美而言」及「獨立自主立場——指與蘇古等共黨集團相結托言」的基本政策^⑯。而左派則以當前的內政部長包赫(Tomás Borge Martínez)為首，包某雖屬尼國之第三號強人，但鑒於當前內憂外困之處境，自不得不以尼國的安危為重，而支持奧蒂加兄弟的緩和漸進政策。然而桑定陣線領導階層內部權力之爭的現象並未因表面的妥協而消失，只是基於權宜之計而暫時緩和罷了。

關於桑定政府內部的傾軋現象，較之「陣線」內部的暗鬭情形更為明顯而嚴重了。「執政團」原來設有五名委員，以奧蒂加

註^⑭ 關於桑定陣線所揭發之十七項「政治綱領」內容，請參 Jose Fajardo et al., *Los Sandinistas* (Bogotá: Editorial La Oveja Negra, 1979), pp. 245-252.

註^⑮ 請參考註^⑭。

註^⑯ 今(一九八四)年六月份以前，尼國代表及奧蒂加本人，曾先後兩度與美國代表及國務卿舒茲分別於墨西哥和尼國本土舉行兩次會談。會談結果未能突破僵局，美國主張尼國履行四點要求：(一)停止對鄰國的「革命輸出」；(二)減少其軍隊數量；(三)驅逐蘇古一國在尼國的顧問人員；(四)實施選舉以維護民主及人權等。而民國則原則上同意由「康塔多拉」集團所提之和平方案，以解決中美洲的緊張局勢。關於美、尼二國在改善雙方關係方面所持之各自立場與主張，詳見雜誌 *The Sun*, April 15, 1982: "The Mission to Managua-George Shultz begins a dialogue with the Sandinistas", *Newsweek*, June 11, 1984, p. 14.

為「協調委員」(Coordinador 亦即主席之意)，另四人分別來自其他反蘇慕薩家族之黨派、名流、鉅子等：如羅伯勞 (Alfonso Robelo Callejas) 是一位工商領袖兼「尼加拉瓜民主運動」(Movimiento Democrática Nicaragüense—MDN) 領導人，卡慕洛夫人 (Viola Barrios de Chamorro) 是尼國最大報社 *La Prensa* 的前社長夫人^⑤，克洛茲 (Arturo Cruz Porras) 係一銀行業鉅子。惟彼等或因政策之爭，或因不甘尸位，或因難以容身而紛紛掛冠求去。其中羅伯勞之辭職最為尼國上下帶來憂懼，更為桑定政權帶來震撼，因羅某原為尼國工商界與桑定陣線間之橋樑人物，他的去職更使工商界為其今後之處境憂心忡忡。羅某去職後復前往哥斯大黎加組織反對黨聯盟——「民主革命聯盟」(Alianza Revolucionaria Democrática—ARDE)^⑥。該「聯盟」下的五個分子組織均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其中最具戰力而又最為桑定政權所畏懼和痛恨者便是帕斯多拉 (Edén Pastora Cómez) 所領導的「桑定革命陣線」(Frente Revolucionario Sandinista—FRS)。

在桑定陣線領導階層的心目中，帕斯多拉是「革命的叛徒」^⑦。帕某在桑定政權中任副國防部長，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因不滿當局的過分親近蘇古及違背桑定陣線之不結盟原則，而悄悄地離開尼國，前往哥斯大黎加與羅伯勞等反政府分子相會合。他在一九八二年春組織「桑定革命陣線」(他之所以仍以「桑定」一詞命名其組織，乃因帕某仍自稱係桑定諾之信徒，且以真正奉行桑定主義為己任)，並參加了「民主革命聯盟」。帕某以其當年在桑定游擊隊組織中的戰績與聲望，立即號召了其舊屬和不满桑定政權統治以及對帕某英雄崇拜的分子前往投效。據帕某自己透露：在「革命民主聯盟」旗幟下反對桑定政權的游擊勢力現在已達

註⑤ *La Prensa* 為尼國最大銷路的獨立報紙，該報曾因於一九七七年揭發蘇慕薩父子及其部屬經營不法生意(輸出血漿)而遭蘇慕薩政權的疾視，並於一九七八年元月派殺手將該報社所有人卡慕洛 (Pedro Joaquín Chamorro Cardenal) 刺死。當時尼國舉國上下為之震驚而憤慨萬狀，益加增強桑定反抗軍的聲勢與力量，從而為蘇慕薩族政權的早日敗亡下了一道促命符。

註⑥ 「民主革命聯盟」建立於一九八二年九月，總部設於哥國首都聖荷西。該「聯盟」由下列七個黨派所組成，即：羅伯勞所領導之「尼加拉瓜民主運動」、帕斯多拉 (Edén Pastora Cómez) 所組成之「桑定革命陣線」(Frente Revolucionario Sandinista—FRS)、由印第安人少數民族領袖雷維拉 (Brooklyn Rivera) 所組織之「少數民族聯盟」(MISURASATA: Miskito, Sumo, Rama Indians)、「尼加拉瓜革命軍」(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Nicaragüense—FARN) 及「尼加拉瓜民主同盟」(Unión Democrática Nicaragüense—UDN)、「基督教民主團結陣線」(Frente Solidaridad Democrática Cristiano—FSDC) 及「尼加拉瓜的民主工人團結」(Solidaridad Trabajadores Democrática Nisargüenses—STDN) 等。在「民主革命聯盟」之下各分子單位均統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不同地區個別從事游擊活動，是反抗桑定政權之第二大力量。

註⑦ 帕斯多拉是桑定陣線乃至全尼國的反蘇慕薩游擊英雄人物。他原與奧蒂加屬於同一游擊組織——「第三縱隊」(Terceristas)，渠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率領游擊分子攻進尼國「民族宮」(National Palace)，控制了兩千多人質，完成了一次最為戲劇化的突襲行動，結果以五十萬美元贖金和釋放六十名桑定游擊分子(其中包括現任的內政部長包赫在內)，以及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宣佈一項「桑定宣言」為交換條件，始結束了這次恐怖事件。因此，帕斯多拉「零指揮官」(Comandante Cero) 的名聲家喻戶曉，桑定游擊隊的聲威遠播海外，而蘇慕薩族政權的腐敗無能，則盡人皆知。

萬人，其在尼國東、南及東北三個邊區的游擊活動範圍已有三萬平方公里^⑥，是當前第二大反桑定政權的游擊勢力。惟該勢力堅決拒絕與美國所支持的、以宏都拉斯為基地的另一股反桑定勢力——「尼加拉瓜民主軍」(Fuerzas Democrática Nicaragüense—FDN)合作。雖然帕某因堅持原則而於今(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在舉行記者招待會時遭到暗算而幾乎喪命^⑦，但其反桑定政權與不向壓力低頭的英雄本色和戰鬥意志並未稍挫。

(二)一九八四年大選問題：桑定政權為實踐其「政治多元主義」，曾允諾將於一九八五年舉行大選，以「還政於民」。而今為何又將大選日期提前了一年？究其原因不外下述各項：(a)在內外交困的情勢下，希望藉著提前的大選來穩定民心，並贏得世界輿論的支持，尤其極欲獲得拉丁美洲「康塔多拉」集團的聲援及「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組織的支持，以便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更多的贊助與同情；(b)企圖以實際的行動向其國人，特別是其反對者，以及美國當局證明其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與決心，藉以遏止美國對尼國拒絕推行民主政治的指控；(c)希望藉著合法的全民選舉為桑定政權建立一個合法的政治基礎，如果由桑定陣線所推舉之總統候選人奧蒂加當選，並能在未來的「國民代表大會」(National Assembly)代表選舉中獲得多數的席次；(d)在選舉時機的安排上，企圖將選舉的日期提前至今年十一月四日，適與美國今年的總統選舉日期(十一月六日)相契合，以便乘機避開美國總統雷根可能向其施加的壓力等。

桑定政府為了辦好這次選舉，曾先後頒佈了「政黨法」(Political Parties Law)、「一四〇〇號指令」和一紙內容頗為詳盡的「選舉法」(共十八章一百五十四條)，並根據是項「選舉法」設了一個全國「最高選舉理事會」(Consejo Supremo Electoral—CSE)和十個「地區選舉委員會」(Zonal Electoral Boards)，負責策劃及執行此次選舉之專責。十一月四日的全民選舉中，除選舉總統及副總統各一人外，並將在十個選舉區內選舉九十名「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⑧。

桑定陣線已將此次選舉看作一次頗為激烈的政治鬭爭。依據上述「選舉法」的規定，自八月四日開始已進入「選舉的政治假期」，所以各反對黨及反對桑定政權之工會、商會領袖，紛紛要求取消緊急狀態特別法、新聞檢查、政黨活動限制，並要求桑定陣線停止對政府事務及軍隊的直接干預，甚至主張削減尼國當前十二萬的武裝人員(其中包括軍人、警察、安全人員等)，以便

註^⑥ Juan Francisco Castaneda, "Pastora says Sandinistas betray Cause", *The Denver Post*, June 3, 1984; 帕氏所稱之游擊力量與所控制之地區均有過份擴大宣傳之嫌。

註^⑦ Robert B. Cullen et al., "An Attack on Commander Zero", *Newsweek*, June 11, 1984, p. 15. 帕斯多拉之被刺原因及其主謀者迄今仍是個謎。不過桑定政權指係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幹，而中央情報局則指係由桑定陣線所為，或稱爲其「民主革命同盟」內部分子欲除掉這個不妥協的死硬派所下的毒手。

註^⑧ 關於此次選舉細節及「選舉法」之內容，請參 *Daily Report* (Latin America), *FBI*S, April 6, 1984, pp. P-22~45.

減輕人民的經濟負擔和不必要的政府支出^{註②}。此外，一位激烈的反對黨領袖克魯茲 (Arturo Cruz Porras)^{註③}甚至直接攻擊「桑定陣線」為「披著革命外衣的獨裁者」，並以隱喻的諷刺口吻稱：「桑定政府旨在藉此次選舉從人民手中爭取一份信任證書，但這份證書必須獲得反對黨的背書始能生效」^{註④}。由此可見，桑定政權欲藉此次選舉以取得尼國上下一致的擁戴與絕大多數精英分子的支持，絕非易事，然而桑定陣線在打贏這場選舉戰的準備工作上已有充分而萬全的佈置。

在反對勢力的衝擊下，桑定集團為緩和內部的壓力，雖然已允諾給予某些讓步，如負責此次大選全部選程責任的「最高選舉理事會」主席努奈茲 (Carlos Núñez Tellez) 曾答應：在選舉期間，各反對黨可以組織聯盟、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宣揚其政綱政策、解除國家緊急狀態等。惟仍堅持：各戰亂地區須予繼續管制、軍事情報及機密問題不得宣洩，以及被列入禁止參選的蘇慕薩舊屬及其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連的分子，不得恢復公民權力等。所以，尼國當前的反對勢力並未因桑定陣線的稍事讓步而妥協，他們仍然繼續要求桑定政府須與所有反對黨派（包括海外的游擊組織在內）先行溝通，始不杯葛此次選舉。然而此一要求已被桑定陣線的「國家指導委員會」所峻拒。至於各反對黨將是否因此而真正杯葛十一月四日的大選，尚須看未來的政情發展，因為各反對黨的利害關係並非完全一致。

桑定政府內長包赫已經向全國誇下海口說：選舉絕不會改變，除非尼國遭致外國的攻擊而被迫交戰^{註⑤}。換言之，除非遭到美軍的直接軍事干預，將來的選舉是不會輕易延期或終止的，此點正可由以上所述桑定政府何以提早進行選舉之理由說明之。此外，桑定陣線在選舉的準備工作與羣眾基礎方面已有妥善的部署，例如其外圍組織——「桑定保衛委員會」(Comités de Defensa Sandinista—CDSs)、「桑定革命青年團」、「桑定工人總工會」、「桑定人民兵」，以及「桑定人民軍」等，均是桑定陣線的有力支持者，其中尤以無所不在的「桑定保衛委員會」是其力量最為雄厚而又最為可靠的羣眾基礎。該「保委會」係仿照古巴的「革命保衛委員會」的組織型態及功能而建立之羣眾團體，負有協助政府宣導及推動政令之責，並擁有監督民衆、分配配給卡、發動羣眾運動、協助治安等職權。目前全國參加「保委會」之委員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佔總人口六分之一，其數目相當可觀。此外尚有十餘萬軍警等治安人員，皆是桑定陣線的忠貞分子，在選舉上諒必是桑定的力源^{註⑥}。不過，尼國的宗教力量也是決定

註② Hildegard Stausberg, "The Discontent with the Sandinistas is Growi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July 4, 1984.

註③ 克魯茲原為桑定政權「執政團」五執政官之一，於一九八二年春辭職而被任命為駐美大使。次年因政策不睦而留美不返國述職，並在美籌組反對勢力。為參加此次選舉，已與其他保守黨派合組「聯盟」(Ramiro Sacasa Guerrero Democratic Coordinating Board)，接受該「聯盟」之提名，參加大選。

註④ *FBIS*, 24 July, 1984, p. P-17.

註⑤ *FBIS*, 20 April, 1984, p. P-6.

註⑥ Robert S. Greenberg et al., "Sandinistas Stiffen Hold on Nicaragu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5, 1984.

選舉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對於尼國政局的是否穩定也具有密切的關係，茲略述於次。

四、日漸昇高的政教衝突問題

我們知道尼加拉瓜原係西班牙之屬地，在承受伊比利安 (Iberian-Hispanic) 文化遺產之餘，八〇%以上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一〇%弱的人民屬基督教信徒。雖然在尼國如在其他國家一樣，政教早經分離，但天主教在尼國的政治領域中自始即扮演著一項舉足輕重的角色。一九六二年第二屆梵蒂岡會議所發展之「解放神學」(Theology of Liberation)，主張神職人員須適當地參與解救人民疾苦、貧困、文盲的工作。尼國天主教神父基於惻隱之心，率多上山下鄉去探求民瘼，並協助農民組織「基督教(天主教)基層社會」(Christian Base Communities—CEBs)和「天主教農村促進委員會」(Evangelistic Committee for Agrarian Promotion—CEPA)等，作為牧民親民的基層組織。尼國天主教會發動此一「運動」的精神，與俄國在一八七四年左右由「人民黨」(Populist Party—Darodnik)所推動的「到羣衆中去」(go to the people)的運動頗為相似。

當桑定游擊組織的反蘇慕薩戰鬪進入高潮階段(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時，這些天主教的羣衆性基層組織便自然地轉變成為天主教與桑定陣線的交會點，也成為支援桑定游擊隊的醫療院、補給站、新兵招集所。而在天主教本身，某些同情桑定陣線及憎惡蘇慕薩家族政權的神父們，如加西亞神父(Father Caspar Garcia Laviana)、卡地諾神父(Father Ernesto Cardenal Martinez)和戴艾斯可多神父(Father Miguel D'Escoto Brockman)等，均先後直接參加桑定游擊隊或作其代言人^②。由此可見，在桑定陣線的革命過程中，天主教及某些神父個人，對推翻蘇慕薩政權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絕大多數的天主教神父及基督教牧師對桑定組織及其革命運動保持超然立場，或僅擔任桑定陣線與蘇家政權的調解工作，如大主教奧班多(Archbishop Miguel Obando y Bravo)本人，即頗希望透過談判的方式，讓蘇慕薩將軍和平下臺，成立一個由中間派所組成的溫和政府。奧氏的努力不僅終於失敗，其本人且被蘇慕薩的「防衛軍」指控為桑定組織的同路人。

天主教基於上述立場，仍然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尼國當前的紛爭局面，故主張桑定陣線在政治方面不僅只採取形式的「多元主義」，或容忍其可容忍的，而且須進一步與其主要對頭——「反抗軍」(Contras)進行對話。這股「反抗軍」包括如下的三個游擊勢力：「尼加拉瓜民主軍」(Fuerzas Democráticas Nicaragüenses—FDN)、「民主革命聯盟」和「印第安少數民

註② 卡地諾神父任桑定政權的文化部長，而戴艾斯可多神父擔任外交部長，他是一個反「干涉主義」——反美的先鋒人物。最近又有兩位天主教神父進入內閣。

族聯盟」。然此一建議為桑定政權所峻拒，而且在「選舉法」的第六十一條第二、三、四各款中明文規定上述「反革命」及「裏通外敵」的分子為非法。桑定政權不妥協的立場與天主教所主張之「以談判代替對抗」和「化戾氣為祥和」的溫和政策，背道而馳。再加上桑定陣線對天主教各教區的宗教活動及神父們對時局的言論所加之限制，如禁止大主教在禮拜五的彌撒活動，剝奪總主教奧班多在禮拜天透過電視的講道權利等，雙方時有衝突。

最近（今年復活節）由羅馬天主教公會簽發了一封公開信（Pastoral letter），再度要求桑定政權能在大選前與所有反對勢力進行溝通，此一要求適與「民主軍」（FDN）的主張相呼應，故頗為桑定陣線所惱怒，並於六月份以「通敵」的罪名逮捕了一位名彭那（Luis Amado Pena）的神父。而大主教奧班多為營救並替這位神父昭雪其罪名，遂於七月九日率領二十七位神父及主教等，以及三百餘教徒，發動了桑定政權自一九七九年建立以來的第一次示威遊行，要求釋放彭那神父^②。此一示威行動非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進一步地激怒了桑定的當政者，遂於當天下午採取了緊急的報復行動，將十名外籍神父（西班牙籍四人、意大利二人、哥斯大黎加二人、巴拿馬及加拿大各一人）驅逐出境，其所持之理由是：因彼等參與反政府的政治性活動，旨在引發政府與宗教界的衝突，故為內政部取消其居留權^③。

天主教為此將採取何種對策或相應行動，迄今尚未明顯，而政教衝突將隨之與日俱增，乃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如果桑定政權今後不能在政治與宗教兩個層面上採取較具彈性及妥協性的措施，將來可能在十一月的選舉方面對桑定政權形成一股壓力。雖然天主教當局已經鼓勵教徒前往投票，但附有一項條件，即這次選舉必須是在「公正、公平、自由」的情況下進行，而且要求信徒應該把選票投給那些「尊重德性與人權並能促進和諧」的候選人^④。奧班多天主教雖未進一步說明：那些人或那些黨派能尊重德性與人權並能促進和諧，但在天主教與桑定陣線日趨衝突的情勢下，其信徒在投下其神聖的一票時，自會知所選擇。這對桑定陣線來說，其為禍為福自是知之甚詳。

五、險象環生的國家安全

蘇慕薩將軍之失國在於其政權之腐敗及樹敵太多，當今桑定陣線所面臨之內憂與外患則歸因於其政策之偏左。「偏左」一則

註② The Washington Times, 10 July, 1984.

註③ FBIS, 17 July 1984, p. P-8.

註④ FBIS, 23 July 1984, p. P-21.

招致外強——美國之不安，二則引起內部保守或較保守分子之不滿。尤當這兩股力量在某些利害條件相一致的情形下而彼此利用及相互托結時，桑定政權所受的內外壓力與安全威脅就倍加嚴重了。

(一) 內部壓力：除了上述之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以及政教衝突等棘手問題外，最使桑定政權惴惴不安者，乃是尼國內部的反抗勢力。前已提及，在尼國內存在著三股主要的游擊力量：即由帕斯多拉所領導的「民主革命聯盟」軍（包括「桑定革命陣線」、「尼加拉瓜革命軍」）^②、由雷維拉所統率之「印第安少數民族聯盟」軍，以及由卡羅斯（Juan Carlos）和門多薩（Mariano Mendoza）等所組織的「尼加拉瓜民主軍」（其中包含「民族解放軍」（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ELN）在內）。前二者的總部（聯合總部）設於哥斯大黎加首府，但其游擊力量則分為兩支，分別盤踞於尼國南部邊區，以帕斯多拉的游擊隊為主，以及尼國東部各印第安少數民族如米斯基多（Miskito）、蘇摩（Sumo）和拉瑪（Rama）等所聚居之東北邊省。後者的基地位於宏都拉斯，其骨幹多為蘇慕薩「防衛軍」舊部，其兵力的三分之二（約五千人）滲透在尼國東北及北部的三個省區。這一反抗軍在美國的支援與訓練下，是當前反桑定政權的主力軍，惟在尼國人民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太壞，而今又以美國為靠山，這在尼國一向反外力干涉的傳統觀念中，恐難形成氣候，更何況它是在奉行美國的政策，乃至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呢！故其成敗關鍵幾乎完全取決於美國，這正足以說明帕斯多拉何以不願與之聯合的主因。

當前反桑定政權的力量雖然是分散的，但其對政府所形成的壓力却是相當沉重的。例如潛伏於尼國南部邊區各地的游擊組織，在帕斯多拉的統一指揮下，除在今年三月初攻佔了尼國東海岸的北聖約翰鎮（San Juan del Norte），並在當月底宣佈以水雷封鎖位於大西洋及太平洋兩岸某些港口外（此一佈雷行動係採取與美國以同樣方式封鎖尼國港口之配合行動，但否認係採取聯合行動），復經常在尼哥邊界一帶與桑定的「人民軍」（Ejército Popular Sandinista-EPS）發生小型游擊戰或狙擊桑定軍的補給線等，成為尼國南部邊區安全的威脅。例如根據帕斯多拉指揮總部第二六七至二七五號戰報的報告，在六月的後半月共發生過大小戰鬥十數次，由此可以推知此一地區動亂情況之一斑了^③。

其次在東北邊區的印第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三個少數民族（米斯基多、蘇摩、拉瑪）共有八萬多人口，彼等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因反對桑定政權在此地推行土改及組織農業合作社，而與之發生衝突。嗣後復因一九八二年之迫遷而再度發生衝突，並導致一萬六千多米斯基多人逃亡宏國及數十人被集體屠殺事件，故引發印第安人之游擊抗暴行動。這一抗暴游擊力量分為兩股，一股聽命於帕斯多拉，而另一股則在法卡（Stedman Fagoth）的領導下，依附於旅居宏國的「尼加拉瓜民主軍」，接受美國的救

註② 請參考註①。

註③ 各地之戰況及戰國過程難以詳述，請參 FBIS, 23 July 1984, pp. P-25-26.

濟與武器支援^②。這兩股印第安反抗軍的人數最少，力量也最小，其對桑定政權所能構成的威脅也較輕微，但它常以少數民族屢遭迫害的呼聲訴諸世人，致使桑定政權摧殘人的罪名遠揚海外，從而對桑定陣線形成另一型態的壓力。

最使尼國政府感受壓力並使桑定政權感受安全威脅者當為以宏都拉斯為基地的「尼加拉瓜民主軍」。該「民主軍」現有兵力約八千，其中二分之一的兵力分佈在尼國的北部山區，在美軍的訓練與支援下，經常與桑定人民軍發生武裝衝突^③。「民主軍」的主要作戰目標不在消滅桑定人民軍的有生力量，而重在以戰鬥為手段去達成如下的幾項策略性目標：(a)阻止或切斷桑定陣線對薩爾瓦多游擊隊的軍事支援，以利薩國政府軍的清剿工作；(b)破壞尼國的地方建設與農業經濟，如一九八三年尼國政府的統計數字顯示，在農、牧、林業方面因戰亂所遭受的損失已超過五千萬美元^④；(c)破壞尼國的重要設施如交通、港口、工廠等，以癱瘓尼國的經濟，並從而動搖桑定政權的統治力；(d)以長期游擊戰擾亂尼國的治安及打擊尼國的民心與士氣，在社會上引發羣眾對桑定統制之不滿等。

(二) 外在的危機：這項外在的危機主要是來自美國。美國為防止共黨勢力在拉美地區的繼續擴展，阻止蘇古向中美洲各國的不斷滲透，以及消滅正在薩爾瓦多蔓延的左派游擊分子等，遂對尼加拉瓜的桑定政權施加政、經、軍三重壓力，企圖迫使桑定陣線改變其左傾、親共及輸出革命的急進路線。在軍事活動方面，除以支援尼國「反抗軍」的方式，使其從南、北、東三個方向對桑定政府軍形成軍事壓力外，並在宏都拉斯建立軍事基地、游擊隊訓練基地、舉行大規模陸、海、空三軍聯合演習或單一兵種作戰演習，如去年的「大松二號」，今年的「海洋冒險」等，甚至對尼國進行所謂「秘密戰」(Secret War)——「水雷戰」^⑤，對桑定政權構成直接的軍事威脅。尤自一九八三年十月稍美國假「東加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OECS)之名出兵攻佔格瑞那達以來^⑥，桑定政權對美國之舉動倍加關切，雖然他們確知雷根政府絕不願乃至不敢輕易冒

註②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8, 1984.

註③ 「尼加拉瓜民主軍」自一九八二年三月以來便加強其對桑定人民軍的攻勢。彼等沿尼宏邊界的山嶺地帶，在三個省區：黑諾第加(Jinotega)、新西古維亞(Nueva Segovia)、奧古塔(Ocoital)以及馬塔迦帕(Matagalpa)等，進行游擊戰。

註④ 另據尼國內政部於一九八四年四月份統計資料顯示，該年元至二月份，因戰爭所造成之損失為：物質損失二千八百萬美元，桑定軍隊死亡二一九人，傷二〇四人，而「反抗軍」傷七三〇人。請參 *FBI'S*, 19 April 1984, P. Q-8.

註⑤ 一九八四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尼國東西兩岸港口進行秘密的佈雷，封鎖了哥林多(Corinto)、桑定諾(Puerto Sandino)及藍田(Bluefields)等港口，使蘇聯、日本等國貨輪觸雷，引起國際輿論的交相指責，同時在美國國會中亦引起軒然大波，甚至被訴之於國際法庭。

註⑥ 關於美國於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用兵格島之經緯，請參劉天均著「格瑞那達問題——鄉土社會主義的悲劇」，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三卷第六期（一九八四年三月），頁六六—七九。

此風險，進攻尼國，發動「第二次越戰」，因為尼加拉瓜在主客觀條件上均非格瑞那達最爾小島可與之相比^①。目前美尼二國一面進行對話，一面加強神經戰。

六、結 論

桑定陣線於一九七九年自蘇慕薩手中奪得政權以來，迄今已逾五載，如僅就其謀國之赤誠言，可謂「羣策羣力，發憤圖強」，惟就其政策取向與推行手段觀之，實難盡服人心，亦難見諒於一向奉行「門羅主義」的美國。因其難以服衆，故時有內鬩，因其難以見諒於美國，故而招致如許之困難——在經濟與安全方面；換言之，當今桑定政權所面臨之諸般困難，其中之半數與美國對尼國的政策有關，尤以雷根政府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對尼國所採取的經濟制裁、支援尼國「反抗軍」、軍事威脅乃至「秘密戰爭」等。當然，美國之所以採取如上之種種措施以對付桑定政權，主要係因其在對外政策上過份疏離美國而親近蘇古，以及支援薩國的游擊組織（Farabundo Martí Liberación Nacional—FMLN）而危及中美洲地區的安全所致。

然就中美洲的安全與美國在此一地區的戰略利益觀之，美國對尼國施加適度的壓力，誠然對維持其「後院」的安全有利，如此正可以誘使尼國對內修正其過左的政策與路線，並使蘇古這兩個幫兇稍事收斂其擴張與製造動亂的野心^②。惟對尼國施壓過重，則非但無益，恐反引發更大之危機。因為在桑定陣線、桑定政權、尼國社會中，均存在著三股均衡的力量——左（極左）、中（左）、右（中間偏左），使桑定政權維持著目前適度的左傾——民族主義大於社會主義的色彩。但這三股力量（除「反抗軍」以外）均具有反干涉主義的共同傾向，因此，如果美國對桑定政權施壓過重，則不僅易導致尼國舉國上下一致的反美情緒，甚至會給極左的馬列主義分子製造掌權或奪權的機會，迫使其其他兩股制衡力量——中（左）、右（中間偏左）向其「一面倒」。果真如此，則不僅是尼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中美洲乃至拉丁美洲的不幸，更是美國本身的不幸^③。

總之，桑定政權解決其當前在經濟、政治、政教、安全等各個層面問題的最佳途徑，在於修正其對內對外的左傾路線，以爭取全民的向心力，減輕蘇古二者的影響與擴張，緩和美國目前所施加的壓力。

註① 桑定政權為預防美國之可能用兵，除加強戰備、實施兵役法、增加國防預算等措施外，並一再向外界宣佈：如尼國一旦遭到外國的攻擊，它將放棄對馬拿瓜首都的防守，而立即展開游擊戰，同時戰爭的範圍也將不限於尼國本土。關於桑定政權如何應付外侵時所持的戰略構想，請參哥倫比亞總統貝當哥（Belisario Betancur）在接受英國記者訪問時轉達其意。見 *The Guardian*, 27 July 1984, p. 15.

註② 在一九八三年秋，蘇聯已向尼加拉瓜提供了十架米格廿一及廿三，這批飛機早已運抵古巴，並由古巴代訓駕駛人員。近據「社會主義國際」人士透露，卡斯特鑒於美國的態度與中美洲局勢的不利發展，乃決定將這批飛機延緩轉交尼國。請參 Dennis Volman, "Cuba Reportedly Holds up Delivery of MIGs for Nicaragu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6 July 1984.

註③ Marcel Niedergang, "Nicaragua-Countdown to Another Cuba?" *The Guardian* (Weekly), August 1, 1982.